

古籍保护

专刊

藏書報

2019年4月22日

总第59期

本刊主编：刘晓立
版式统筹：万修远
联系电话：0311-88643113
投稿邮箱：liuxiaoli0119@163.com

藏书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联合主办

国家、地方馆藏机构主动出击 举办多种活动，助力古籍“活起来”“传下去”

本报讯（记者刘晓立）保护与传承是古籍保护事业的核心，而人才则是决定这项事业成败的关键。近年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多次举办古籍鉴定、普查、修复、保护等各类培训班，以培养古籍保护人才。不仅如此，向全世界展示中国古籍之美，引起大众对古籍保护传承的关注与自觉，也是古籍保护事业发展的动力。今年4月，围绕古籍的保护与传承，多地图书馆纷纷主动出击，举办培训、参观、展览等活动，助力古籍“活起来”“传下去”，形成多方联动推动古籍保护事业的态势。



山西！“第三期全国碑帖拓片保护与修复技术培训班”开班

2019年4月9日，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办，山西省图书馆承办的“第三期全国碑帖拓片保护与修复技术培训班”在山西省图书馆开班，来自全国各地的29名学员和山西省城的26名旁听学员参加了此次培训。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特别邀请复旦大学图书馆特聘专家、传习导师赵嘉福，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冀亚平，山西省图书馆特聘专家、传习导师胡玉清，上海图书馆传习导师邢跃华为学员授课，讲授拓片的产生、拓片的用纸和用墨、装帧技术和拓片的修复技术。

据悉，山西省图书馆于2010年启动了“山西民间石刻文献拓制保护工程”，有计划地对全省范围内所存民间石刻资源进行了拓制保护，目前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今年将开展馆藏拓片整理、编目和修复工作，本期培训班的举办正逢其时，将为下一步石刻拓片整理保护工作顺利开展培养人才，储备经验。

山东！“第四期全国碑帖编目与鉴定研修班”举办

2019年4月10日，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办，山东省古籍保护中心和孔子博物馆承办的“第四期全国碑帖编目与鉴定研修班”在孔子博物馆开班，来自全国12个省（市）图书馆、博物馆、高校图书馆的30名学员参加了此次培训。

此次研修班邀请到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施安昌、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冀亚平、北京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胡海帆三位碑帖研究领域的专家授课，采取“理论+实践”的教学模式，以孔子博物馆馆藏的碑帖拓片为教学内容，通过专家讲授和学员实际操作，系统开展碑帖拓片的编目和版本鉴定培训。通过培训进一步推动古籍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古籍保护利用水平，加强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传统文化的挖掘阐发和系统研究，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江苏！百余中外青年走进南图，感受古籍之美

2019年4月3日至6日，第三届“一带一路”青年创意与遗产论坛在南京举办，一百余名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青年代表、联合国青年领袖代表，围绕“文化遗产保护与创新发展”“文学与城市的可持续性发展”等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和交流。该论坛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长沙市人民政府和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作为“热身活动”之一，4月4日，第三届“一带一路”青年创意与遗产论坛的代表们走进了南京图书馆，这座前身可追溯到清代1907年

的国家级图书馆，藏书总量已超过1200万册，其中古籍160万册，令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代表和教科文组织馆员大开眼界。“这是一座伟大书籍和知识的宝库，不仅是留给中国人的，同时也是为全世界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世界联合会主席Dhirendra Bhatnagar在参观南京图书馆古籍部时，连连惊叹。

当天，各国青年代表们还参观考察了江宁织造博物馆、南京师范大学“书衣坊”、先锋书店等地，并就各自所在城市或国家的文化特点，进行了创意分享。

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天一阁博物馆

多措并举 藏用结合 天一阁古籍保护成果喜人

始建于明嘉靖年间的天一阁博物馆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共登记藏品22万件，以古籍、书画、碑帖等纸质文物为特色，其中尤以保存大量明代典籍而著称于世。天一阁博物馆现藏有古籍16万余册，仅善本和孤本就有8万余册，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5322部。在此基础上，天一阁还不断在文物征集、古籍修复、研究出版、典藏数字化等方面着力提升，使馆藏资源化身千百、藏用并举。

近年来，天一阁博物馆先后出版了《天一阁藏历代方志汇刊》《天一阁藏张寿镛手稿图录》《石鼓墨影》《天一印语》《天一阁诗辑》《嘉靖宁波府志》《天一流芳》等书籍，此外，《天一阁文丛》也已出版至第十六辑，可谓在典籍的研究出版方面卓有成效。其中，《天一阁藏历代方志汇刊》共收书523种4400册22万页，是天一阁首次将馆藏全部古代方志结集影印出版。此外，还历时五年，全面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天一阁所藏

文献分类整理与研究”并结题，研究成果查清了天一阁所藏文献的确切数字，对天一阁文献进行了全面、系统、准确的清理。

在对馆藏文献进行整理研究的基础上，天一阁还积极开展馆藏建设，近年来征集到古籍等各类藏品4000余件（套），其中，成功征得全套完整的铜版画《平定两金川战图》16幅，弥补了旧藏散佚的遗憾，使馆藏“乾隆三宝”重聚首；获赠《文澜阁四库全书》影印精装本一套1559册，成就了天一阁与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因缘会聚。此外，天一阁持续推进新修地方志和家谱的特色馆藏征集工作，2017年至今共征集到新修方志952册家谱1377册，较大地丰富了天一阁馆藏。

作为文化部设立的首批12家“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之一，近年来，天一阁古籍修复团队在每年完成一万余页馆藏古籍修复的同时，有计划地对外承接古籍修复项目，更好地服务社会。同时，启动文物消杀间建设和

文物库房整体消杀项目，推进纸质文物科技保护工作。2016年，天一阁古籍修复技艺被成功列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为使古籍修复技艺得到更好的传承和更多的关注，天一阁博物馆策划创立“大美·古籍”主题文化教育品牌，在普及古籍相关知识的同时全面展现古籍中所蕴含的文字之美、形式之美、匠心之美，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让博物馆教育不再是简单的学校课堂的延续，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课堂发挥其更大的价值和作用。

2010年，天一阁古籍数字资源库建成投用后，成为国内公共图书馆及博物馆中首家大批量提供古籍整本原书免费检索、阅读和研究功能的公益机构，标志着古老的天一阁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数字化”时代。数字化的古籍以天一阁馆藏善本为主，其中不少为海内外仅存孤本，尤其以明代地方志、科举录、浙东地方文献等最具代表性的内容为主体。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84部重要典籍全部



囊括其中。公众只需进入天一阁古籍数字资源库的网站，即可查阅所有入库古籍的目录。开放至今，天一阁古籍数字资源库网站的注册用户达8743人，访问浏览点击量为1960708人次。2012年起，天一阁博物馆设立了免费对外开放的古籍电子阅览室，公众在古籍资源库网站上查询到的相关书目都可以在古籍电子阅览室里进行阅读。此举实现了公众与古籍资源的“亲密接触”，真正做到了古籍的“古为今用”。

（王伊婧）



徐鼐的《小腆纪传》是南明史研究的名著，其子徐承礼增辑有《补遗》五卷。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说：“鼐虽熟于明季掌故，蓄志著述，然曾兴办团练，镇压太平军起义，其人则极为反动。盖有心之士，研究南明史事，志在鼓吹革命；而缙绅士夫为维护封建统治，亦欲藉此以为借鉴也。”不少关于《小腆纪传》的研究，实际上是基于《晚明史籍考》的改编或发挥。

徐鼐（1810—1862），江苏六合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官至福建福宁府知府。他有三个儿子。长子徐承禧（1832—？），以监生历任福建长乐、福安、莆田等县知县，福州府福防同知，邵武、延平等府知府；次子徐承祖（1842—1908），光绪三年（1877）任出使美日秘国大臣随员，光绪十年（1884）任出使日本国大臣；三子徐承礼（1846—1905），历任驻日本国神户兼大阪地方事务正理事官、浙江定海直隶厅同知、浙江洋务局提调、台州府知府兼办台防营务处。徐鼐父子四人的仕途升迁都与“军功”有关。镇压农民或所谓“会匪”的各种反抗、起义，几乎是他们一生的事业。

徐鼐说他们家早年“资用华腴”，父亲徐石麟“幼处膏腴”，这都是拜其曾祖从事米业贸易致富所赐。徐鼐的曾祖“连阡陌，构广厦”，挣下了很大一份家业。因为祖父去世得比较早，徐石麟这一房也随之而“中落”，不得不自立门户，“析家产

为七，华好楼屋任诸叔择之，已分得马廐圃溷十余间，改葺为课徒塾”。据自编《年谱》，困居翰林院的徐鼐到咸丰初年时已“负债万金”，连担任外官的钱都是借来的。可不到十年光景，在经历过办团练、劝捐助饷等事宜之后，徐鼐却突然有钱刊刻四十多卷的自著书了。光绪十二年（1886）徐承祖在日本时，印行了父亲的《敝帚斋遗书》六种五十八卷。不久，徐承禧、徐承礼在南京刻成《小腆纪传》六十五卷《补遗》五卷。1934年，徐承祖之子徐椿又重印一千部《小腆纪传》。这哪里还看得到家道中落的影子。

徐石麟一定还会分得其他房产，因为“马廐圃溷”绝不可能用来住人。徐鼐的《显考轶陵府君行述》没有提到的还有“连阡陌”的田地。徐鼐的曾祖靠“报效军饷”而得到了一个直隶州同知的虚衔，祖父、父亲先后报捐训导。徐鼐的儿子们也一样。徐承禧由监生议叙县丞，加捐布经历，后又以同知衔报捐本班；徐承祖以监生报捐县丞，后加捐同知。这每一次报捐大概都需要一百至六七百两不等的纹银。在光绪十五年（1889）的江浙赈捐中，徐承禧以正五品准补福州福防同知的身份报捐“三品升衔”，用银2873.5两，是近800名报捐者中纳银最多的一位。徐承礼是荫生，驻外正理事官的正五品同知衔多半也是报捐而来的，这个费用大约是纹银1000两。徐鼐自己是趁着“推广筹饷事例，许翰詹科道捐任外官”的机会，

古书背后的人和历史

史学家光环照耀不到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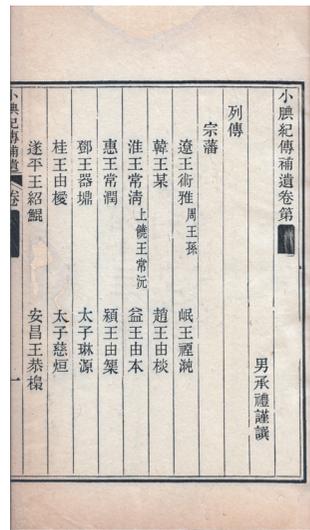
□湖北 陈琦

“告贷”出京，参与镇压太平军的。所以，他们家可能经历过一段时间的“中落”，但有房有地，“浮财”也不少，后来还渐渐有了很大的起色。

徐承禧在福建曾奉命委办福清、崇安、水口、管头、汀洲等处榷务。除了任台州府知府，徐承礼还兼办盐厘总局，这些都是“肥差”。光绪七年（1881）御史邵积诚参奏徐承礼贪黠巧诈、行同无赖、苛索供应、借端讹诈、受贿息事，尽管福建督抚回奏称其“尚无劣迹”，但后世确有他勒索钱财和“酷吏”的口碑。光绪三十年（1904）御史黄昌年参奏徐承礼任用私人、不守官箴，在王锡彤事件发生后，“徐承礼如病痲狂，无所措手足，延至半月始率防勇赴县，洗杀无辜，劫掠村民”。结果浙江巡抚回奏以无确切事实可查，请免置议。徐承祖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因在出使日本大臣任上“贪劣侵欺”被参奏革职。曾国荃上奏说，徐承祖在六合原籍被查封的财产有“住屋并钱铺、赁屋各一所，荒熟田地一千七百余亩”以及其他资财。最后，在曾国荃的偏袒下，以徐承祖赔缴亏折洋厘银32015两、给还家产免治其罪。一年后，“以缴清赔款，复前出使日本大臣已革道员徐承祖职”。这大概是“捐复”的结果。那些曾被查封的家产，曾国荃说“估价无多”。然而，在短短的一年内，徐承祖就能拿出三万多两银子赔缴亏累并捐复原职，家底明明是非常厚实的，曾国荃怎么就没有查抄出来呢？曾国荃和福

建、浙江官员一样，对徐家兄弟“爱护”有加。其中有何缘由，就不好妄加猜测了。

徐鼐和他的儿子们，都以经世自命。直到今天，除了《小腆纪事》等之外，有关晚清外交、经济、军事的研究中还会经常出现他们的名字，著作被一再引用。他们及其著作的价值，自然是不能轻易否定。不过，类似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称徐鼐“长于治学，而短于治事”，说他“无经世之才，而好抵掌谈天下事”这样的言论，似乎也应当得到关注。时人对徐承禧临阵时的胆怯无能是有记载的。徐承礼因为血腥镇压王锡彤的反洋教起义而名声大噪，当时就被留日学生所办的《浙江潮》口诛笔伐，但清廷内部却有他闻警慌张的说法。他们的军事和应变能力到底如何，真不好说。徐承禧兄弟三人都曾遭到参劾，他们是如何当官的，恐怕也不能认为是与经世治学无关的事情。



建纸库也得交“学费”

□浙江 汪小帆

经过三年的学习、思考，我开始意识到，在中等规模的修复场所建立一个专用纸库是何等重要。这个“专用纸库”，特指古籍修复单位储藏古籍修复用纸的专用库房，一般是把平时按照计划逐步有序采购到的古籍修复用纸，妥善地存入库内，方便进行科学的日常管理，主要还是服务于修复流程中的配纸工序。

所谓“配纸”，就是为古籍书页破损部位的连接、补缀或托裱寻找修补的纸张材料。由于每一部书的刊印年代、地区、条件等不同，所用纸张的厚薄、颜色、质地、帘纹及密度也各不相同，所以，配纸是一项非常烦琐、细致的工作，关乎古籍修复工作的质量和工作效率。故建立古籍修复用纸纸库具有重要意义。在建立纸库时，可以组织有经验的古籍修复工

作者或通过专业的技术设备，对所储存的备用纸事先进行纸性、颜色、厚度、纸纹等分辨鉴定，分类存放。修复过程中，修复工作者只要根据备用纸样的分类标识按图索骥，即可找到自己所需要的补纸类型。这样，既保证了古籍修复工作的质量，也避免因寻找合适的补纸而浪费时间，提高工作效率，还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因纸张胡乱堆放导致的纸张损毁。”这段话是我于2010年在《兰台世界》上发表的《古籍修复用纸纸库建设刍议》开篇立题的一段话，文章所谈的，都是我在工作实践中的所思心得，但时至今日反思，文中有些观点、思考不甚成熟，所想表达的内容过于繁杂。虽然提出了建立纸张编号体系的观点，但未具体阐述编号体系该如何更具科学性。比如，纸张是按纸性分，还是按生产地域、生产年份进行分类？现在回想起来，这恰恰是因为当时对手工纸张的复杂性了解肤浅，加上求成心切，导致自己在内心深处回避了一些难题，不敢直面解决问题。再比如，

虽然提出在搁板的外侧面贴上标识牌，标识牌上的内容应包括编号、纸张名称、采购地点、纸张颜色、纸张厚度、纸张重量、纸张规格、入库时间等信息，具体而微，全面周到，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恰恰没有考虑到，在外侧板有限的空间内，如何标示如此多的细目。此外，也由于眼光保守与思路的局限，未曾设想尝试用数据库的形式，实施实地仓储式管理。虽然这篇文章是我在修复纸张系统建设和管理方面进行理论研究迈出的第一步，而且也是当时行业内较早思考这一问题的论文之一，终因思考欠成熟，拿来指导纸库建设，免不了走了一些弯路。

2010年年底，我们计划添置一批存纸柜。当时按传统书架样式自行设计，双开门，分上中下三层。中间层内部用搁板分成四层，为玻璃门。上层下层是木门，内部分别用搁板分为两层。计划中间层存放整叠的纸张，上下层存放零散碎纸（要知道，七八个人的一个修复中心，日常产生的零

碎纸量也是相当可观的）。纸张存放也是照原有纸张按英文字母+阿拉伯数字顺序编码存放。当时觉得方便简单，一目了然。使用了没多久，问题出现了：搁板间距离较宽，如存放同一种数量较多的纸，使用起来从上往下取还是比较方便的；但若是不同几种纸放在同一个搁板内，碰到恰恰要选用压在最下面的那叠纸，就惨了。修复人员要像举重运动员一样，把上面的几叠纸全部上举托高，另一个工作人员才能取出最下面的纸张。老是如此“运动”，纸张经常相互摩擦，极易损伤。可见设计不合理。还有，由于我们并未制定相应的编码规则，只是拿到一种纸就给一个编号，随意性大，没有规律可循，造成取纸时往往拿着纸张登记本转上老半天，才能找到所需的纸张。

意识到这些失误，只得推翻再来，包括重新制作专门的纸柜！学费交了，教训也买了，痛定思痛：要完美地做成一件事，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当然，我们的目标是尽可能减少付出的代价。

有温度的手工纸，凝聚了无数人的心血与爱

复旦举办手工制纸非遗传承人交流研讨会

2019年3月30日，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手工造纸工坊迎来了二十余位中国传统手工制纸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与制纸行业资深从业人员，他们就手工制纸的现状、特色、经验等方面，与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副院长杨光辉，特聘教授、木板水印工作室负责人倪建明，青年教师李燕，及2018级古籍保护与修复专业的硕士生开展了深层次的交流。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手工造纸工坊成立于2018年9月，旨在让更多的人了解造纸工艺，同时推动古籍保护和修复工作的发展与创新。成立半年多的时间，手工造纸工坊迎来了众多的体验者。在复旦大学出版社经世书局内部的一个小庭院里，参与者们“化身工匠”，一边参观了解古代造纸技艺，一边用简易造纸设备，现场体验从捞纸到成纸的全过程，感受传统工艺的魅力。

这次，手工造纸工坊迎来重量级“体验者”，作为中国传统手工制纸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与制纸行业资深从业人员，他们的“专业化操作”会给手工造纸工坊带来什么样的不同呢？

□上海 陈俊儒

“ 产学互动： 一线“大咖”讲述108道工序里地血汗史

在杨光辉、倪建明两位先生的主持和带领下，各位来自不同地区、掌握多种手工制纸技术的非遗传承人们，在手工造纸工坊进行了抄纸技术的展示与探讨，并体验了木板水印、瓦当蜡拓等传统艺术的操作。同学们在互动过程中，也就自身专业与兴趣对各位非遗传承人进行了专访，比如各位传承人从事造纸的经验与艰辛，种种细节，令人感叹。

“断竹。”这是先秦诗谣《弹歌》的首句，是中国诗歌史的开始，也是手工制纸手艺人千年劳作的开始。江西铅山连四纸传承人李强介绍，连四纸就是主要采用当地嫩质毛竹作为原料。“叠成三四米高的竹堆，经过漫长水淋自然发酵腐烂后，仅余不足一米。之后，还要借助人工踩料，24小时不能间断，异常辛苦。”李强告诉同学们，做这些的目的都是为了使所得纸张纤维纯净洁白，绵密柔韧。那从“断竹”到一张成品连四纸发出脆亮的清音需要多长时间呢？李强回答说：“最少一年。”

在这漫长的手工纸制作过程中，

每一道工序都凝聚着工人们的辛劳汗水。竹子芽叶未生、软硬适中的时间极短，砍伐时恰逢暑气正盛。浙江奉化棠岙纸传承人袁建增介绍，工人们需要在炎热的天气中上山砍伐苦竹、毛竹等，往往不到一个小时便会大汗淋漓。安徽泾县乌溪宣纸传承人肖武君介绍，宣纸的制作过程亦是如此。为了达到日晒雨淋自然漂白的最佳效果，工人们要在夏季担上百斤的青檀树皮上山曝晒，因为唯有日光与水，才能使得纸料浮茸尽去，筋骨莹澈。这样做出的宣纸，方称得上是“纸寿千年，万载存真。”

据肖武君介绍，手工制纸通常分为约72道大工序，细分可多达108道，甚至超过110道。用袁建增的话说，每一道工序都需要精雕细琢。其中，“捞、晒、剪”并重，剪纸也是一道必不可少的大工序。安徽省级非遗传承人郑志香便是中国宣纸集团公司的一位剪纸女工。“剪纸”既是“剪”，同时是“检”。一位技艺精湛的剪纸工，不但能运剪如飞，将百张宣纸一刀剪妥，而且在多年经验之下，纸的轻重

瑕瑜全部掌握于手中，每一张经过检验的纸都是合格的，都是美丽的。

不单是纸，作为抄纸器具的纸帘，自古亦用冬天剖得的竹篾剥丝编制。

“40余道工序全凭人手，无法用机械代替。一个人，一张小四尺的竹帘，快的也要三天半的时间，慢的还要更久。”安徽泾县小岭村抄纸竹帘传承人曹一松在采访中说。传到曹先生手上，他的家传竹帘已经是第7代，造纸技艺是第28代了。将近一千年前，“不可居无竹”的苏轼在《东坡志林》中写到当时新鲜的竹纸：“今人以竹为纸，亦古所无有也。”而今，断竹的裂帛之声早已传入千家万户，汇聚成海。

活动中，同学们不仅看到了手工制纸非遗传承人们展示祖辈流传下来的造纸技艺，而且更好地了解了手工制纸的现状与细节，杨光辉表示，希望通过非遗传承人给研究生指导，让同学们切实感受传统工艺的魅力，加强对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感。他说：“本次交流活动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开头。”

何为“美”： 对草木的致意和对工艺的坚守

3月30日下午，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手工制纸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座谈会举行，非遗传承人们讲述了自己对手工制纸的理解，分享了手工纸之“美”及特点。

传统手工造纸与农耕文明密不可分。曹一松的祖上，即是宋末造纸工匠曹大三。曹大三由于缺少耕地，才开始制纸谋生。但制纸为业的人们，常常也被称作“纸农”。与农业一样，手工纸完全依赖自然的恩宠。日本美学大师柳宗悦说：“唯有感念自然恩宠的人，才能称为优秀的制作者。任凭自然驱使的工法，才能得到绝佳

质量。”肖武君会遗憾现在的檀皮、稻草等质量均不如前，宣纸品质当然受到影响。而据云南丽江东巴纸传承人和秀红、王正琼介绍，东巴纸正是以云南专有的瑞香科菟花为主要原料，才成就其得天独厚的特点：防虫蛀、韧性强、耐火烙、可刺绣、双面书写，吸墨性好，泡水不烂，等等，在众多传统手工纸中一枝独秀。

柳宗悦在《和纸之美》中发问：为何纸张的毛边能增添风情？这也是倪建明注意到的现象：市场最偏爱的手工纸，并非规整齐平，反而必须边缘任其本然，不施刀削。柳宗悦的答

案是：手工最重要的是能呈现温润的自然恩泽，自然以未经掩饰的风貌，展示在人们眼前。一旦我们能直接感受到自然的力量，任何纸张皆美。

李强强调，手工制纸最大的特点是存在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因此，为了让制出来的纸趋近于完美，晒纸师傅们往往连汗都不敢滴到纸上。就像同是省级非遗传承人的捞纸师傅朱建胜所说的那样，手工艺的分量全在心中。手工纸不是单纯的自然，也不是极端的工业，它是对草木的致意和对工艺的坚守，它是最实用的美，是万物与人的平衡。

传承与革新： 手工制纸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手工制纸的传承现状不容乐观，由于很辛苦很累，没有大的收益，很少有年轻人愿意进入这门行业。郑志香说，剪纸的大剪刀把手磨破是常事。东巴纸原料具有微毒性，竹帘大漆也易使人过敏。但秉持着对家乡、对传统文化的热爱，非遗传承人们不断谋求生存、创新发展，比如浙江丽水松阳皮纸传承人潘黎明、李坑村古法造纸传承人周芳娣等，在做着体验与旅游、传承与教育和手工制纸技艺结合的尝试与推广；陶建通、许赛丹夫妻，开办了温州市非遗体验基地“时光印记”生活美学馆，给所有喜爱传统文化的朋友提供了解的渠道和创造的空间。他们介绍说，非遗体验基地有很多课程走进了校园，特别是民工子弟学校和希望小学，

希望自己的努力能使传统文化的影响润物无声，让我们的下一代，充满希望的孩子们，获得熏陶与滋养。潘黎明说，造纸的水是冰冷的，但造成的纸凝聚无数人的心血与爱，充满温度。

“弄墨抹彩画家事，造纸术理几人识。”最传统的技艺应当成为我们最珍贵的记忆。“生活在纸里”的非遗传承人们“只想把纸做到最好”的纯粹与执着，对古籍保护与修复专业研究生有着很大的启示与激励作用。同学们也期盼在自己专业的学习中，能以科学的角度研究发现手工制纸过程中还存在的问题与不足，给大国工匠以继续改良精进的可能，为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新生增光添彩。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自创院之日起，就在手工纸技艺的传承与工艺革新方面投入了重要研究力量，他们与开化县政府合作的“开化纸工艺恢复项目”将传统工

艺与现代科技手段结合，如利用生物基因栽培技术解决菟花原材料问题，以生物霉促进造纸生产效率，来重点解决纸张的寿命问题。“希望通过用现代科技对开化纸技艺的重新恢复与改造，逐步扩大到其他传统造纸技艺，使古老技艺得以传承与发扬，非遗传承人得以保护与提升，古籍保护事业得以健康落实。”杨光辉表示。听过非遗传承人们的讲述，杨光辉提出倡议，希望非遗传承人们可以成立传统手工纸联盟，将多姿多彩的手工纸作为整体，向全国与世界推广，走好科普与人文教化的技艺复兴之路。

“纸”作为媒介，千年来承载太多的历史与文明；“纸”本身，更是伟大的美与技艺之结晶。中国的造纸术早已遍播世界，但让世界重新正视中国手工纸之美的事业，才刚刚开始。这幅纹理纵横、汇聚文脉与匠心的长卷，或许就从这次活动徐徐展开。





清代藏书文化兴盛，同光时期，逐渐形成了有名的藏书四大家，分别为常熟铁琴铜剑楼瞿氏、湖州皕宋楼陆氏、聊城海源阁杨氏、杭州八千卷楼丁氏。皕宋楼藏书后来被日本岩崎氏购得，今藏静嘉堂文库。常熟瞿氏藏书也没能完整流传，收藏相对分散。海源阁藏书在历次战争中多毁，现存的也仅是少数。时至今日，较为完整地藏在中国大陆的，只有丁氏八千卷楼旧藏。

4月13日是八千卷楼主人丁丙逝世120周年纪念日，南京图书馆“家国书运”八千卷楼藏书特展正式开展。同日，“2019古籍整理与保护学术研讨会：丁丙先生逝世120周年纪念”举行，来自文博界、文献学界的专家学者围绕八千卷楼藏书的历史、文化以及丁氏家族畅所欲言，从各自角度表达了对丁丙先生的仰慕与追思。

“八千卷楼”：丁氏藏书兴衰及收归南图的经历

八千卷楼肇始于丁丙的祖父丁国典。丁国典因慕先世丁顛（北宋藏书家）藏书八千卷，于是在杭州修了一座小楼藏书，并题名“八千卷楼”。其子丁英，继承父亲的藏书志向，往来南北，搜求书籍，使得丁氏藏书日

益丰富。传到丁申、丁丙兄弟，二人更肆力购书，八千卷楼藏书量达三万册左右。

咸丰十一年（1861），由于太平天国战乱，八千卷楼藏书毁于一旦，丁丙《八千卷楼收藏书籍记》云：“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贼再陷杭州。寒家无长物，惟藏书数十橱传自祖庭者，悉遭毒厄……特寒家八千卷楼所藏，无一册壁还，易胜惘然。”战争虽让八千卷楼旧藏付之劫灰，但丁氏兄弟在颠沛流离之际仍竭力搜购书籍，这也为之后八千卷楼复兴打下了基础。同治三年（1864）三月，清军夺回杭州，丁氏遂得返里。此后，丁氏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古籍收藏，并最终成为清季四大藏书家之一。丁氏藏书，虽然以宋元旧槧来说，不能与他三家相比，“然经庐三传，史备晋唐，亦云难得”。除了宋刻元刊外，还有如四库底本、名儒校本、大家藏本等特色藏书，种类极为丰富。也因此，八千卷楼藏书可谓明清两朝藏书家之结晶，在丁丙两兄弟手中达到巅峰。

光绪三十三年（1907），丁氏家族经商失败，八千卷楼第四代主人丁立诚做主将藏书整批卖给江南图书馆，以补亏空。在江南图书馆同仁的保护下，八千卷楼藏书经历清末剧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虽有战火侵蚀，但大体仍较完整。1952年，当时的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即江南图书馆）并入国立南京图书馆（今南京图书馆），八千卷楼藏书亦一并入藏南图。所以，南图今日的古籍收藏，特别是善本古籍的收藏，可以说是建立在江南图书馆藏书之上的，也就是以八千卷楼藏书为中心的。南图所藏万余部善本古籍中，有丁丙题跋的就有2200余部，蔚为壮观。

丁丙不仅是一位藏书大家，更热心社会事业。丁氏收藏图书不为炫耀，也不作为秘不示人的私藏，而是将罕见之本刊刻流布，以嘉惠艺林。其种种志业中最值得一提的，还有在太平天国战争间抢救文澜阁《四库全书》，

且在战后奋力钞补，使文澜阁藏书几复旧观。而今，江南三阁中仅有文澜阁能劫后重兴，可以说多仰赖丁氏之力。正因为此，柳诒徵称赞“丁氏于文化史上之价值实远过瞿、杨、陆三大家”。

“家国书运”：传承古籍中蕴藏的文化与情怀

2019年正值八千卷楼主人丁丙逝世120周年，为纪念这位近代著名的藏书家，4月12日，“家国书运——八千卷楼藏书特展”在南京图书馆开幕。此次活动由南京图书馆、江苏省古籍保护中心、江苏省图书馆学会古籍整理与文献保护专业委员会主办，南京图书馆承办，上海图书馆与浙江图书馆提供部分藏书支持，据悉，这是南图首次从他馆借展，实现了八千卷楼丁氏文献一次历史性的合展。

中国古籍保护协会会长刘惠平、南京图书馆党委书记韩显红、浙江图书馆古籍部主任陈谊、南京十竹斋董事长陈卫国出席了开幕式，另有特邀专家学者、图书馆界同仁到场参加。刘惠平在致辞中高度评价了丁丙等古代藏书家对古籍与文化遗产的巨大贡献，鼓励公共图书馆继续挖掘古籍的使用价值，进一步发挥社会教育功能，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韩显红着重介绍了丁丙和八千卷楼藏书收归南图的历程，以及南图对八千卷楼藏书的保管与整理利用情况，体现了南京图书馆薪火相传、服务社会的精神；陈谊在致辞中赞扬了丁氏家族藏书护书、化私为公的家国情怀，简述了两馆的历史渊源与文化使命，表达了在新时期加强馆际合作交流，构建长三角公共图书馆服务一体化的期望。

此次八千卷楼藏书特展采用实物与展板相结合的方式，分为“卷起八千”“插架琳琅”“文澜再现”“嘉惠艺林”“益山公藏”五个部分，展示丁氏家族的藏书史及其为文化事业所做出的贡献，以及自归藏以来，南

京图书馆对八千卷楼藏书的收藏、研究、出版情况。展览共展出55部古籍和两块书版，其中包括6种四库底本，为南图有史以来展示四库底本最多的一次。另有稿抄校本33种，包括爱日精庐抄本、卢文弼抄校本、孙星衍稿本等名家大儒收藏、手校的珍贵文献。展览现场有历史文献部的工作人员进行讲解，读者还可通过扫描二维码获取更多展品信息。现场还举办了体验雕版印刷、活字印刷、铃印、抄写等多项活动。

召开研讨：七位专家学者揭示八千卷楼藏书意义

4月12日下午，“2019古籍整理与保护学术研讨会：丁丙先生逝世120周年纪念”在南图举行，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江庆柏、南京大学教授徐雁平、浙江大学教授陈东辉、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苏芑、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石祥、天一阁博物馆副研究员李开升、国家图书馆副研究员马学良七位专家学者，围绕八千卷楼藏书的历史、文化以及丁氏家族做了高质量的学术报告。

其中，江庆柏结合此次“家国书运——八千卷楼藏书特展”的展览内容介绍了四库底本的鉴别方法；石祥提出丁氏未刊题跋对掌故轶事与文献考证的揭示意义，并对当下题跋整理的方式方法提出新思路；马学良介绍了明内府刻本的相关情况以及丁丙不因刊刻机构而妄下评论，重视对明内府刻本收藏研究的事迹；徐雁平重点介绍了丁氏藏书对江浙两地文献收藏与研究的巨大贡献；陈东辉的《杭州丁氏刻书中的外地刻本考述》另辟蹊径，拓展了对八千卷楼的研究领域，引发大家对于丁氏藏书研究方向的新思考；苏芑围绕八千卷楼藏书《乐府新编阳春白雪》，讲述了黄裳与该书的一段轶事，追忆前人读书、藏书、访书之乐趣；李开升简述了丁氏与天一阁藏书的不解之缘，并探讨了丁氏作为藏书家的特质与属性。

南京图书馆举办系列主题活动

纪念八千卷楼主人丁丙逝世120周年

□本报记者 刘晓立

中国活字印刷源流及几个问题（五）

对一些活字本的个案研究

□北京 艾俊川

在活字印刷史研究中，过去因为一直忽视对书籍版面的观察、分析，往往仅根据文字记载断定版本，造成一些错误。其中就有一些活字本，或因错误的鉴定受到“特殊对待”，或因未能甄别出来而“明珠投暗”。下面就分析几个具体的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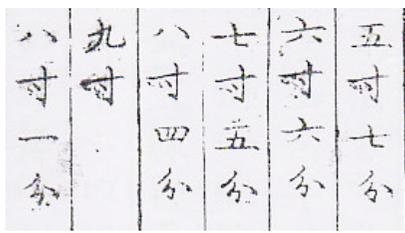
吹黎阁活字本《文苑英华律赋选》

《文苑英华律赋选》，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吹黎阁活字印刷。此书封面及目录叶均题“吹黎阁同版”五字，张秀民先生等认为“同版”就是“铜版”，将其定为铜活字本。实际上，此书中“铜”“同”二字多次出现，均各守本义，没有一处是混用的，因此不能说“同版”就是“铜版”。事实上，观察版面不难发现，其活字残损严重，木刻刀痕明显，板框愈向后膨胀愈甚，均呈现典型的木活字特征，应为木活字本。

泰山瓷版的制作工艺

康熙末年，泰山徐志定“偶创瓷刊，坚致胜木”，印刷了张尔岐的《蒿庵闲话》和《周易说略》二书，自称“真合泰山瓷版”，别具一格。但泰山瓷版是怎样制作的，一直众说纷纭，未有定论。

今观察版面，可以发现如下现象：一是很多具有相同特征和缺陷的字，在



图为《蒿庵闲话》卷一第三十二页中，相同字形和缺陷的“寸”字。

不同书叶都有出现，证明其版确由活字排成。二是这些具有相同特征和缺陷的字在同一叶也有出现，证明它们是用同一个模子制造出来的，显然不是木活字。三是有两处版面的行间空白处露出正方形的字钉痕迹，证明空白的地方是用一个个高度低于活字的字钉填满的，再次证明这是由活字排成的印版。四是版面出现大量从板框和文字中间穿过的断裂线，证明最终印书使用的版已非活字版。因为如果排版用的是已焙烧坚硬的瓷活字，它们是不会沿着某种轨迹一起断裂的，只有混泥整版入窑烧制，才会出现这种龟裂现象。

根据这些特征，结合书中“磁版”“磁刊”的文字记载，泰山瓷版的制作过程应是这样的：先用阴文范母将瓷土制成

湿泥单字，再排成版面，入窑烧成瓷版，然后用来印书。

公慎堂木活字本《题奏事件》

因为来华传教士的著作中有关于清人用蜡版印刷报纸的记载，印刷史界遂把带有连续出版物性质的《题奏全录》《题奏事件》等书看作蜡版印刷品。实际上传教士们对中国“蜡版”记载来自辗转传闻，均未经目验，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说法分歧，如对用来刻字的蜡究竟是软还是硬，就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说法，“蜡版”说法令人疑。

今观察乾隆间公慎堂印《题奏事件》版面，可见其字新旧不一，有的字残损严重，字形完全相同的字会出现在不同书叶，有些字的周边有方形墨痕，属于字面底层的边缘印迹。各种特征均说明，《题奏事件》是木活字印刷品，而不是“蜡版”印刷品。

李瑶活字印本《南疆绎史》

清代苏州人李瑶，于道光九年、十年，两次用活字印刷《南疆绎史》，书的牌记上题写“七宝转轮藏定本仿宋胶泥版印法”，今人遂以为李瑶复原了宋代毕昇发明的胶泥活字版，并用来印成这两部书，但李瑶并未对他的技术作出说明。

今观察《南疆绎史》版面，两次印

刷使用的并非同一套活字；每套活字的同一个字均不相同，并不是用模子塑造的，不符合清代泥质书版的做法。考察文献，道光十年本《南疆绎史》是一部40多卷800多叶的大部头书，李瑶用在排版、印刷上的时间只有5个月，根本没有烧制泥字的时间；他花费的银钱，正好与当时请活字印书铺排印一部同等规模的书相似。因此，李瑶印书用的活字不可能是“泥活字”，而是普通的木活字，所谓“胶泥版印法”，只是借用典故表示“活字版”而已。

清岭南寿经堂锡活字印本《陈同甫集》

美国传教士卫三畏曾报告，清道光咸丰之际，广东佛山一位Tong姓人士（现译为“邓”）曾铸造2套锡活字，共20多万枚，用来印刷彩票，也用来印书。邓氏的锡活字后来在战争中散失，他印的书也一直没能甄别出来。

国家图书馆藏有两部陈亮所著《陈同甫集》，分别著录为“清活字本”“清刻本”。其中一部封面题“岭南寿经堂版”。仔细观察，排印此书的活字每个字都一样，显系同模铸字。卫三畏的书中保留了邓氏活字的三个字样，与《陈同甫集》中的字对比，完全契合，可见这部书就是邓氏用锡活字所印。（完）